

湖北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北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北文史资料

第六辑

湖北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汉市汉阳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毫米 25开本 8.5印张 157,5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刊编号：鄂内字第0047号

定价：0.75元

目 录

怀念军长徐海东	张希才(1)
党的朋友唐义精校长	张执一(18)
抗战初期党在荆沙的组织与活动	余 杰(24)
抗战初期党在宜昌县活动的部分情况 ——回忆学院街小学	张一之(47)
武汉“一二·九”运动及其前后的回忆	姚树森(59)
监利县抗日自卫队的斗争纪实	郑桓武(98)
有关武昌首义的若干重要史实	陶德琨遗稿(113)
川军援鄂	喻钟珏藏稿(128)

湘军援鄂的前因后果

.....彭伯勋(142)

统治鄂东时的程汝怀

.....瞿汉超(146)

王劲哉盘踞鄂中的见闻

.....杨惠民(156)

祸国殃民的王劲哉

.....秦 镜(163)

有关张公堤的一点回忆

.....饶杰吾(166)

沙洋筑堤

.....杨经曲遗稿(168)

天祐坑一案始末记

.....吴先铭(171)

旧中国宜昌鸦片市场的点滴

.....冯锦卿(180)

天主教襄阳教区划分前后

.....易宣化遗稿(185)

意大利传教士是怎样运送和使用武器的

.....艾伯镛(190)

订正与更正.....(194)

怀念军长徐海东

张希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徐海东同志身边工作多年。四十多年来，逝去的岁月冲刷着记忆，带走了许多往事，但海东同志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绩，却时刻铭记在我的心上，常常把怀念的思绪带回到同他一起工作、战斗的日日夜夜中去……。

襟怀坦白 对党忠诚

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张国焘实行右倾逃跑主义，擅自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了苏区。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二十多万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残酷“围剿”，无数村庄被烧毁，成千上万的妇幼老孺被杀害，地方革命政权几乎丧失殆尽，留守根据地的少数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弹尽粮绝，损失惨重。徐海东同志当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率七十九团在英山地区作战，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在这空前严重的形势面前，海东同志的革命意志愈加坚定，他怀着必胜的信念，和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等同志一道，把零散的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东路游击司令部，不久改为红二十七军。在海东同志和刘士其、郭述申、吴保才、王建南等领导同志指挥下，红二十七军首战趾风河，歼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部一个团，给猖狂的敌人迎头一棒，尔后转战英山、霍山、潜山、太湖、舒城、桐城等六县广大地区，在蕲前、官庄、大沙河等地，给敌四十七师、

三十二师、五十四师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斗争信心，对坚持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在一个多月的东路游击中，他连续二十三天没有上床睡觉，累的吐血，人瘦了一圈。记得在磨子潭战斗中，敌人占据了周围的高山，我军被压在河川峡谷里，眼看就要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海东同志一马当先，带领一团猛冲猛打，硬是从敌人火力网中杀开一条血路，为全军开辟了突围的通道。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下旬，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红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以后又任副军长、军长。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在建军原则、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上，展开了一系列路线斗争，徐海东同志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秉公直言，与错误路线进行顽强地斗争，为开创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二年底到三三年初，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形势稍有好转。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省委错误估计形势，提出“夺取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的冒险主义军事行动方针，于五月间贸然决定夺取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七里坪。海东同志认为，七里坪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两面有制高点，工事坚固，守敌三个团六千余人，驻在附近的敌军还可随时增援。而我军总兵力不过一万余人，既无攻坚条件，兵力也不足以围攻该镇和阻敌增援，根据地屡遭敌洗劫，人民生活困苦，部队给养供应毫无保障。他坚决反对打这一仗。他的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严厉批评。七里坪战斗开始后，我军终因条件不具备，久攻而未克。随着时间的拖延，部队困难重重，给养、药品等供应几乎断绝，每日以野菜树叶充饥，广大指战员被拖得精疲力尽，纷纷流露出怀疑和不满情绪。海东同志再次向省委提出撤围建议。当时，部队中正推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路线，

谁怀疑上级决定或给领导提意见，随时有可能被打成右倾分子，反革命而遭到迫害，轻者受处分，重者被处决。为了维护革命利益，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据理力争，坚决反对继续围攻七里坪的冒险主张，说：省委围攻七里坪的决定本来就不妥当，久围而不克，打疲劳战，不是我军的战术。现在部队的消耗这样大，再不撤就会被拖垮。假如外围的敌人来个反包围，对我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却再次遭到无理的批判，被说成“右倾保守”，当场将他推出会场，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七里坪战役打了四十三天后，我军减员近半，所剩五千多人体力极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不得不决定撤围。七里坪战斗终因路线错误而告失利。在这期间，海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虽未被及时采纳，但他那坚定的原则性和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却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陕南地区，决定在此开辟根据地。少数同志受错误路线影响，畏惧困难，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认为，国民党正规军盘据多年，实力雄厚，陕南山区地盘小而穷，补给困难，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我们与他们会合力量大”等等。到了三五年初，随着敌人大举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领导意志的统一和红军的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会上两种主张斗争十分激烈。海东同志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我军创建陕南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逐条驳斥了右倾逃跑主义思想及言论，说：“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红色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

红军的兵力。至于困难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内部勾心斗角，统治不牢固，又缺乏山区作战经验，这正有利于扬我之长，击敌之短；陕南军阀与蒋介石矛盾较深，便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过去，党曾在这一带发动过农民运动，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又两次路过这里，党和红军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只要我军搞好宣传，启发群众觉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得到群众的支持，站稳脚跟。这番话有理有据，说的大家心悦诚服，一致拥护省委的决定。日后的斗争实践证明，海东同志的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军在陕南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经五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初步建成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徐海东同志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深恶痛绝。他看到许多同志惨遭迫害，心急如焚，毅然挺身而出作坚决的斗争，尽最大努力，想方设法保护同志。有一次，军部交通队的一名保卫员被逮捕了。海东同志知道后，立刻去找负责肃反的人，责问他为什么要抓这个战士。那人回答说：“我看他长得象反革命”。海东同志一听就火了，指着他高声说道：“你简直胡说八道！看相纯粹是搞迷信，怎么能没有根据就乱抓人呢？”叫他当场把人放出来。不久在皖西北的英山附近，军保卫队队长王汉林被人诬陷为“AB团”而扣押起来。我当时是保卫队指导员，长期同汉林同志一道工作，知道他出身贫苦，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突然变成反革命了呢？我实在想不通，就去找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反映。正谈着，海东同志来了，听到此事非常恼火，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上次抓我的保卫员就是胡闹，现在又抓王汉林，太不象话了！”于是，我立即去找肃反负责人，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把王汉林接回队里。被海东同志保护下来的同志还有许多，我的一位老首长郭述申也是其中一个。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给他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要处决他，海东同志拍了桌子坚决反对，才使他免于被害。在当时那

种情况下，这样做当然是非常危险的，海东同志却不怕担风险，为党保存了许多骨干。这些同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海东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委派程子华同志来红二十五军工作，海东同志主动向省委建议：由子华同志任军长，自己由军长改任副军长。省委同意后，他热情地向程军长介绍情况，积极配合工作，并多次向我们这些部门负责人交待说，子华同志是代表中央来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支持他，使子华同志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十一月底，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后，与中央的联系中断了。海东同志十分焦急，经常念叨着：“不知中央到哪里了，要知道消息该多好啊！”他交给担任前卫的手枪团一个重要任务，每到一地尽量收集敌伪报纸。报纸找来了，他和军里几位首长总是一张张的仔细查找有关中央红军的情况。三五年七月间，当他终于从敌伪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向陕北行动的消息后，就象失散多年的孩子即将要见到日夜想念的母亲那样欣喜万分，激动的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这下行动有方向了，我们很快就要见到党中央、毛主席了！”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坚定地表示，为了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就是我们全军这三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省委决定部队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于是，海东同志指挥部队主动向西出击，攻两当、打天水、克秦安、斩断西兰公路，尽最大努力来吸引敌人兵力，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同年九月十八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海东同志任军团长。他号召全军团“多打胜仗，巩固、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在他和军团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的共同指挥下，红十五军团打了劳山战斗和榆林桥战斗，一举歼敌一个师部二个团又四个营，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重大胜利，迎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十一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联合打了直罗镇战斗。中央红军的一个连队与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共同作战。由于这个连队刚经过长征，人员身体很弱，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几次攻击都未奏效，正在重新调整兵力准备再攻时，二二三团的顾政委在旁边傲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什么“你们不行就撤下来，看老子的”等等。海东同志很生气，立刻把他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不尊重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老大哥部队的错误言论，当即宣布给予撤职处分。随后，他利用这一典型事例，教育全军克服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加强与兄弟部队的团结，说：革命部队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毛主席，我们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物资奇缺。海东同志要求全军：“中央缺人给人，缺钱给钱，缺物给物，一尽最大力量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指示供给部把多年积累的经费、物资“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中央”。那时，我正在后方组织兵站部，他专派财务科长傅家选来找我，我们根据他的指示，立即赶往瓦窑堡小东门附近的教堂，找到中央供给部叶季壮部长交了清单，办理了上交手续。记得有金银首饰、银元、烟土、布匹等。这期间，还从部队中抽了一批轻机枪、步枪和弹药上交中央。对其他兄弟部队，海东同志也是同样如此。红四方面军快到陕北时，他就考虑到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饱尽艰辛，生活一定会更困难。亲自交待我筹集一笔钱，养上一大群羊，再搞点粮食和羊皮，做好迎接的准备。红四方面军刚到达，我就带着粮秣科长徐前贵和运输队，赶着羊群，把钱和物资送到驻在半个城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徐海东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向来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红军时期，他从师长改任团长，军长改任副军长。抗战开始后，又从军团长改任八路军旅长。每次他都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即使是

在受错误路线的排斥打击、个人蒙受冤屈的时间里，也仍然一如既往，努力工作，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和积极性丝毫没受到影响。他反对打七里坪战斗而受到批判后，毫不气馁，积极采取措施，以减轻部队遭受的损失。不久，敌人两个师发动进攻，海东同志脱下上衣和长裤，只穿一条裤头，手握驳壳枪，率交通队最先冲上去。战士们见此情景，个个奋勇当先，一个猛冲，打垮了敌人一个旅，俘敌四百七十余人。

海东同志曾经说过：“只要能为党工作，叫我干啥都行！”的确，他就是这样怀着对党的无限信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海东同志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他却居功不骄，谦虚谨慎，名利面前从不伸手。一九六〇年，他奉中央之命，负责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给参加编写的同志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和高贵的品质！一九六二年，他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满怀深情地说：“象我这样九次负伤，又得了重病的人，之所以仍然能够活在人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有中央领导同志和战友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心情舒畅！”话语间，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一颗拳拳之心，跃然可见！

身经百战 屡建奇功

在我军的战史上，许多胜利是与徐海东同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他英勇善战的故事传奇般地在鄂豫皖陕等广大地区流传，不仅为人民群众所赞颂，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无可奈何的点首叹服。记得在一九三四年三月的葛藤山战斗中，海东同志略施巧计，诱敌上当，一举歼敌近两个团，活捉旅长柳树春。这个出身保定军官学校的老牌军官，起先以为能打败他的红军指挥员必定是哪个军

校的高才生,当他得知徐军长毕业于“青山大学”时,不禁目瞪口呆,感慨万分。海东同志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驰骋疆场,屡建奇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必然结果。我跟随海东同志战斗多年,对此有切身体会。在军部工作期间,经常可以看到他不顾行军作战的劳累,抓紧空隙时间认真学习,钻研战术,就连重病躺在担架上还坚持看文件。每次作战前,只要时间允许,他总是虚心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博采众长。战后,他不是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勤奋的学习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他的知识和才干不断增长,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半私塾的穷窑工逐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

自从红二十五军重建以来,我们这支三、四千人的队伍经常遭到一、二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我军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在这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海东同志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采取长途奔袭、化装偷袭、声东击西、围城打援等多种方法,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在人民战争这个历史舞台上,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使红二十五军无论在苏区还是在白区,也无无论在长征途中还是在会师以后的无数次对敌作战中,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三四年七月初,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出动了十五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狂言要在三个月内将我军“彻底肃清”。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当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海东同志率领部队与敌周旋,寻机歼敌。七月十七日晨,我军途经罗山县长岭岗时,发现号称“王牌”的敌东北军一一五师师部及两个团摆在光秃秃的长岗子上,戒备甚疏,未发觉我军。海东同志与吴焕先政委商量后,当机立断,定下了歼敌方案,迅速指挥部队攻击。他自己和吴政委分别带两个营猛冲。由于指挥得当,使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我军巧妙地转化为局部的优势,先集中兵力打垮敌六四三团,尔后又猛攻敌师部及六四四团,仅用三

一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缴获五挺轻机枪，二百余支长短枪和许多军用物资。战后，海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部队情绪高了，你这个部党委书记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做多了。”（注：部党委书记管军直属队）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笑着继续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整整消灭敌人五个营。”长岭岗一仗，给敌人“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极大地鼓舞了我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斗争。同时，缴获了大批精良武器，大大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许多连队配齐了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营换上了“奉天造”马步枪。这对于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红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为以后的长征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省委指示，由皖西北赶赴鄂东北，听取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传达中央指示，研究今后行动计划。敌人闻讯后，用五个师的重兵重重封锁我前进道路，用四个师十六个团尾追不放，企图前后夹击，阻我前进。海东同志和吴政委研究决定，选择当面之敌的薄弱部位，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封锁线，甩掉敌人。六日晚，我军从葛藤山出发，先以急袭战术全歼驻商城以南汤池的敌一〇九师工兵营（四个连），尔后边走边打，两夜一天急行军二百余里，连打四仗，打垮敌一〇七师两个团和一〇八师一部，一鼓作气突破四道封锁线，其中有敌人经营已久，吹嘘是“连麻雀也飞不过去”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就在光山县城以南的斛山寨稍事休息。谁知还没两小时，尾追之敌集中了十个团的兵力跟踪而至，分别从东、南两面发起突然袭击。我军从熟睡中惊醒，仓促迎战，被分割成好几块。敌人气焰十分嚣张，“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亲至战场上空督战，指挥飞机轰炸扫射，用优势兵力反复猛攻。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海东同志临危不惧，与其他领导同志冷静分析了敌情，认为目前我军极度疲劳，如果仍用“走”的老办法来摆脱敌人是很困难的。只有坚守住并打垮敌人的进攻，才

能突出重围顺利前进。于是，他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命令七十四师坚守阵地，牵制和消耗敌人。二二三团迂回到侧后攻击，解二二四团之围。尔后再集中这两个团的兵力，从侧后攻击被七十四师拖住的敌人。与此同时，他果断指挥七十四师发起反冲击。敌人遭到三面夹击，顿时阵脚大乱，纷纷溃败逃窜。就这样，在海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我军由仓促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转危为安，全部击溃和大量消灭了敌人。敌人丢失了大批武器弹药，损失近四千人。广大指战员兴奋地称颂这是一次神奇的战斗。在我们红二十五军的战史上，象这样以劣胜优的战斗是数不胜数的。

红二十五军之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屡战屡胜，始终占据主动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指挥员徐海东同志具有认真负责、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之前都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勘察地形，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把得来的各种情况加以分析整理，根据敌、我、民情这些客观条件，仔细研究，反复推敲，制定出合理的作战方案。一九三四年八月底，省委为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决定攻打英山县城。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进至城下，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先进行仔细的调查，发现敌城防工事坚固，守备严密，人数较多，如果我军冒险硬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经反复侦察和研究，他建议不打英山而去奔袭太湖县城，因为太湖距安徽省会安庆市较近，攻克后政治影响更大；太湖没有工事，守敌少，我远程奔袭，出其不意，胜利把握较大；它是敌人后方，物资丰富，对解决部队物资供应困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我军于九月三日傍晚出发，利用两个夜晚，急行军二百二十余里，于四日午夜时分，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以伤三人、亡一人的代价，攻克太湖县城，缴获许多马匹和大量药品及其它军需物资。战后，全军每人都发了一把雨伞。当时经常露宿，雨伞派了大用场。战士们风趣地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

我们这些老同志都知道，海东同志先后负过九次重伤，身上

被打下十个窟窿，闻悉噩耗，在他南征北战的生涯中，曾经遇到过多少次危险，经历了多少回生死考验。在艰巨的战斗面前，海东同志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英勇无畏的气概，显示了整个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临危不惧、沉着、坚定的惊人胆略。在炮火纷飞战场上，他从来不顾及个人安危，总是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甚至带队冲锋陷阵，撤退时往往又留在后面，担任掩护。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的康家河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坚决不肯离开火线。让人包扎一下后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直至战斗胜利。后来伤口未好仍坚持工作。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早晨，我军在甘肃省合水县板桥镇正集合准备出发，敌人一个骑兵团突然向我袭击，眼看敌骑兵就要接近我军，海东同志命令参谋长立即组织转移，而他自己亲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前去拦截，掩护部队撤退。几十名勇士在他带领下，犹如猛虎下山，直扑敌群，锐不可挡，立即搅乱了敌阵营。由于双方骑兵混在一起，敌人无法继续冲击，只得撤开我主力来对付骑兵。厮杀了一阵后，海东同志估计主力已远去，便令骑兵边打边退，而他则同几个同志继续掩护。敌人见此又气又恨，大声叫嚣：“抓活的！”“别让他们跑啦！”一窝蜂似的拥上来。俗话说：“艺高人胆大”。面对凶恶的敌人，海东同志毫无惧色，枪打刀劈，杀得敌人人仰马翻，顺利的冲出了重围。正当全军上下为他的安全担心时，他带着满身硝烟回来了，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关心同志——爱护部队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徐海东同志参加了组建红二十五军并始终领导了这支部队，使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骨干力量。这正是他始终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建设军队，用马列主义培育干部，教育部队的结晶。徐海东同志对红二十五军有特别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在担任军

军事指挥员的同时，时刻关心每个干部战士的成长，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找同志们谈心，了解部队思想动态和他们的疾苦，讲述革命道理。那时干部变动频繁，但他对全军营以上干部和绝大多数连排干部都了如指掌，可以说出各人的家庭情况、脾气性格、工作能力等。他每次与人交谈，不是以训斥的口气，而是推心置腹，谆谆诱导，让你听后心情舒畅，该解决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记得有一次，我们供给部领导之间因工作产生了矛盾，团结不好。海东同志马上找我们谈话，他并没有猛“克”一顿，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帮助我们交流思想，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之间就好比左右手，配合不好会自己打自己，团结不好会影响工作，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所以，应该顾全大局，互相谦让，互相配合。”我们听了很受教育，从此十分注意互相之间的支持和谅解，工作有了新起色。

海东同志治军严正，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违犯了纪律，他都毫不客气的给予严肃批评，绝不姑息迁就。在我身上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任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一营政委时，在一次行动中，我营担任本队，与前卫手枪团和海东同志带的后续部队都失去了联系。白天跑了一百多里地，连打四仗，晚上打开山阳县城后，部队又饿又累，可城里的人都跑光了，找不到一粒粮食，战士们只好忍饥挨饿，和衣躺在路上睡觉。见此情景，我心里非常焦急，部队还要继续行军作战，不吃东西怎么行呢？于是，我派出一个排，要他们无论如何设法搞点粮食回来。一个钟头左右，粮食搞来了。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动作这么快？一了解，原来他们跑到附近的山脚下，向天打了几枪，躲在山林子里的一些老乡被吓跑了，战士们就把丢下的粮食拣了一点回来。这时，海东同志带着后续部队上来了。见部队在吃饭，问粮食从哪里来的，我们汇报了上述情况后，他十分生气，严厉地批评说：“白区的群众本来就受反共宣传的欺骗，不了解红军是什么队伍，你们这么做，破坏了我军